这些年，两会最关注的高教话题

全国两会召开，不少高等教育相关的话题被代表、委员们所关注，引发公众广泛讨论，甚至促进改革的步伐。在期待今年两会新的话题之际，不妨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过去几年里，两会上最为人们所关注的高教话题都有哪些。

2010年 热点话题：规划纲要

话题背景 就在2010年两会前夕，备受关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那时至今，这份中国教育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成为了中国几乎所有教育改革指导方针。在2010年两会上，这份“新鲜出炉”的规划纲要以及纲要背后所代表的对中国教育改革路线的思考，自然成为代表委员议论的重要话题。

两会观点

许仲梓（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南京市副市长）：《规划纲要》文本明确提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一直以来，高校把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这两个职能当作工作重点，但忽视了本应该大力提倡的服务社会职能，这点应该加以改进。

朱清时（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规划纲要》提到，未来10年高等教育将进入发展理念战略性转变的新阶段。大学应当立志树立追求学术自由、学者自律的大学精神，改变高校内部“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和行政权力干预学术的情况。

孙霄兵（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今后我们的改革要把人才的培养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导向。这次《规划纲要》的制定与之前的一些文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就是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记者评述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在2010年两会上，代表委员对这份纲要的认识与解读并不及后来的那样深刻，但《规划纲》要颁布的本身，就已经足以引发教育界人士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与思考，而这一点，在此后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陈彬）

2011年 热点话题：自招联盟

话题背景 自2003年推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以来，各高校主要采取分别考试录取的方式。但这一状况在2010年发生了改变，在这一年，“北约”“华约”“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生联盟相继成立，自主招生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这种新模式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受“小高考”“掐尖儿抢生源”的质疑，在2011年两会上，一些教育领域的代表委员也对此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两会观点

葛剑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从理论上讲，自主招生应该全部放开。真正的自主权包括名额、方式、命题、录取都由学校说了算，但现阶段因地区差异、公立大学等原因还做不到。

钟秉林（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高校自主招生涉及“人才的评价标准”“通过什么方式把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两个问题。高校自愿组合“联考”，为考生提供更多选择机会，降低奔波成本，值得尝试和肯定。

贺优琳（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中山纪念中学校长）：在中国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缺少的是专才、怪才、偏才。高校如果真正想挑选到偏才、怪才，就应该是在高考结束后再进行挑选，自主招生的着眼点应该是抓高考的漏网之鱼，抓到这些偏才和怪才。

记者评述 2011年两会上，对自招联盟或褒或贬的代表委员们也许不会想到，在仅仅创建4年后，三大自主招生联盟就于2014年宣告解体了。

自招联盟有其政策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不成熟的联盟形式本身还存在着太多的缺点和不足。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多校联考形式虽然目前还不完善，但这并不代表这种模式本身存在方向性问题。恰恰相反，该模式其实是世界范围内比较普遍的招生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联盟的解散更像是一种“休克疗法”，我们期盼着未来，一种更完备的联考模式出现在我们面前。（陈彬）

2012年 热点话题：异地高考

话题背景 2012年3月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异地高考是有条件的，除了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外，还对家长和孩子有一定条件要求，家长要在当地有工作。”由此，异地高考成为当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教育话题。

两会观点

李建保（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制度上肯定有很多需要设计的问题。在异地高考和防止高考移民这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如何能够避免钻这个空子，真正地兑现异地高考，我觉得需要很严密的讨论和制度设计。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纳入这个系统，同时对电子学籍进行实时更新和管理，并与全国电子户籍管理系统联网互通，从而为中央教育经费划拨、地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招生比例分配等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

伍中信（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建议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条件相一致的原则，全国可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异地”区域，允许考生在本区域内异动，如湖南考生到江苏参加高考；也允许西部地区考生向中部、东部区域异动，但不允许东部、中部区域考生向西部区域“逆向”异动。这样一来，“高考移民”实现了异地参加高考的初衷，又不占参加高考地区的分数“便宜”，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

记者评述 可以说，异地高考的问题绝不是简单的教育公平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012年的两会上，异地高考备受瞩目，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言献策，按照时间表，2012年底，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必须出台，是为异地高考的“破冰之年”。

于是，人们看到，最终出台的各地方案中，与其他省份相比，京沪粤三地的异地高考“门槛”明显更高。其中，北京和广东的方案都强调过渡和渐进。而上海，则一如此前多方预料，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制度挂钩。在京沪粤之外，无论是人口流入大省且教育资源丰富的浙江，还是一些人口流出大省江西、河北、河南等地，推出的异地高考方案通常未对家长的住所、收入、社保提出要求，“低门槛”的特点显著。

在户籍制度不改革、教育资源不均的情况下，理想中的异地高考政策势必会触动部分人的利益，因而，在可见的范围内，异地高考诉求最激烈地区的政策改革只能是小打小闹，就像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说过的那样，异地高考的难点就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韩琨）

2013年 热点话题：就业难

话题背景 教育部官员在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表示，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699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就业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一边是农民工“用工荒”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有职业经验和技能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者严重短缺，工人的劳动报酬“水涨船高”；另一边则是大学毕业生们陷入“就业难”困境。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令无数家庭纠结、煎熬，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热点话题。

两会观点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就业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结构调整太慢，本来大学生应该大量地进入服务领域，而我国现在的服务业占据的比例较低，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二是大学的教育结构与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这两方面问题解决好了，就不会出现大量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王汝成（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目前有很多高校专业报考遇冷，但是就业却很紧俏，如何让报考和就业相平衡，是解决就业难的关键。对于这样矛盾的就业环境，首先，教育部门要加强宏观的指导和调控；第二，要更多关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第三，要培育就业队伍，尤其要培育急需冷门专业的就业队伍。

关爱和（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大学生就业难，与求职环境不公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绝对关系。国家应试着改变求职环境的不公平，整顿整个求职秩序，公平公开竞争。同时，现在有很多基层的工作和岗位没有人去，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不愿意去，因为收入和生活条件要差得多，这就需要国家给予基层工作者更多的升迁机会，改变生活环境的条件，调节收入方面和其他岗位的区别。大学生自己也要作好到基层工作的准备，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记者评述 2013年，699万名毕业生的数字成为了公众口中的“最难就业季”，然而，今天的我们回头再看，毕业生的人数在2014年、2015年更是不断攀升，分别达到了727万和749万人。随着经济增长放慢，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发严峻。

除了经济形势影响就业外，就业难的问题也在提醒高校对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例如真正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把课堂教学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等。之后，我们也看到，主管部门提倡，600所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正是认识到了不同高校的定位以及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变革，需要面向现实。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就业难的问题在许多人眼中，是学校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诚然，就业难当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学校教育息息相关，但是，落实到每一位毕业生个体而言，就业问题中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就业能力与求职心态。而这，是个人必须努力提升，才能适应社会的。（韩琨）

2014年 热点话题：高考改革

话题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高考制度带来的高分低能现象，成为制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瓶颈。2014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透露，高考改革将在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考试一年多考、高考招生参考综合素质等方面发力。与此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高考改革方案最迟在当年年底出台。

两会观点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目前社会上广泛关注高考弱化英语科目地位的问题，以前我们的教育把英语看得过重，现在则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英语不是不重要，但它的重要性对于不同学校以及不同专业的学生是有差异的，应当进行分类管理。

钟秉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取消文理分科为创新。要让学生有创新意识，要养成高素质，除了知识结构能力培养，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训练。学习文科，是训练人的形象思维能力，理科则是训练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只有把两种思维能力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创新。

马敏（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高考改革不在于改形式，关键在于改内容，真正达到减负、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一年多考不宜过分主张，如果高考一年多考，是否会真正减轻负担、达到改革目的？对此要慎重。

记者评述 高考改革可谓是中国教育改革中最艰难的一环。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之争，是民间针对高考改革的最大争议。教育公平在改革中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位。然而，为了公平而公平，却使得改革常常举步维艰，甚至出现暂时的“倒退”，如自主招生政策的收紧。

2014年的高考改革究竟是大刀阔斧，还是小修小补？在一些高教人士看来，维持现有人才培养方式、选拔方式的高考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它没有跳出分分必较、重智轻能的框架。但我们依然欣喜于改革所作出的哪怕一丁点进步，因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使劲，“积极稳妥”，总有一天能够到达彼岸。只是，我们的创新型人才建设耗得起吗？或许，每一次重大的、代表进步的教育改革都是前进的推进器，我们希望它来得更猛烈一些。（温才妃）

2015年 热点话题：大学生创业

话题背景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创业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出路，而大学生无疑成为了创新创业的生力军。2014年底，教育部发出通知，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在全民创新创业的热潮下，大学生创业迎来了“黄金时代”。

两会观点

谢和平（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校长）：优秀大学生创业就是利用他们的知识、智慧、所学的专业来开创技术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使中国形成一批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打造中国经济社会的升级版。大学生创业不存在失败。现在社会上讲的失败算的是一笔经济账，实际上大学生创业成败的过程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严琦（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政府扶持的话要做的不只是“输血”，不是仅仅给大学生点钱，应该是政府来搭台，企业来运行孵化基地。建议充分发挥大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引领作用，加强见习制度的扶持力度，并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俞敏洪（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不反对亦不鼓励休学创业。不反对是因为真的有创业热情且有创业机会的大学生，不让他休学是一种伤害。但休学创业不能过多鼓励，会导致还没有作好创业准备、没有创业资本的学生以休学创业为名出去玩。

记者评述 除了总理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社会上之所以出现“创业热”，还在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通过创业促进就业。

严格说来，无创业经验、无资金成本、无人脉的大学生并非最合适的创业群体，但是，时代赋予了他们良机——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他们将是未来创新创业的主人。因此，切莫狭隘地理解了创业，鼓励大学生盲目地创业或不创业。实际上，创业也许并非人人适合，但创业精神却是人人必需。每一位青年都应有梦想、有野心、有实干、有坚持，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生机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温才妃）

中国大学评论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须打造一流的基金运作机构

■李锋亮

众所周知，一所大学的运转与发展需要大量经费作为支撑。因此，众多大学，尤其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也纷纷通过建立、发展专门机构募集捐赠、基金运作，为大学的发展提供经费支持。纵观美国一系列顶尖的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等，这些美国顶尖大学不但以一流的教学与科研著称，她们高效运作和管理的教育基金会（或者类似的筹款机构），同样也是许多大学竞相学习的榜样。比如，耶鲁大学一直以来因其基金投资的高收益闻名，其中大卫·史文森和迪安·高桥两位金融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掌管下，通过优化投资组合，耶鲁大学的基金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投资收益，市值在30年里增长了11倍之多，平均收益率达20%之多，2014年捐赠基金增长达到了17.4%，成为了大学教育基金模式的典范，为大学取得了丰厚的经费支持。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D.B.约翰斯通提出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提出高等教育的成本应由政府、企业、个人、家庭和慈善捐赠者之间合理分摊。“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出现，为之后美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迅速发展和职能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的捐赠以及投资所获的回报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重要的一个来源。因此，美国的很多顶级专家开始关注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筹资与投资的能力、策略与效率。比如，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期权之父”金融学家罗伯特·C·莫顿在1993就提出大学教育基金会应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运营资金，建议大学教育基金会运用组合投资的方法使资产增值。

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近年来，已有一些美国顶尖大学进一步加强了教育基金的投资与运作的力度，并在名称上对相关机构作出了实质的改变，比如哈佛大学将其称为资产管理公司，耶鲁大学将其称为投资办公室。这表明这些大学的教育基金机构已经转变为专业的基金管理和投资机构，主要职能就是将捐赠基金甚至一部分其他资产进行专门的、专业的管理、投资和运作。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了行文方便，依然将美国大学的这些投资机构统称为教育基金会。

目前正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重要阶段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尽管在办学经费的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高等教育全球化趋势，单纯依赖国家拨款和科研项目经费依然难以支撑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而且持续的资金。因此，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美国同行的做法，通过建立、发展教育基金会或者类似组织，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来筹措经费。

我国目前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仅有二十余年发展历史，最早的是1994年成立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中国高水平大学的教育基金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规模获得了迅猛的提高。尽管和美国高水平大学的同行相比，中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规模上依然有着多个数量级的差距。但在笔者看来，规模上的差距并不是中美大学教育基金会之间最主要的差异。笔者认为和美国同行相比，目前中国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最主要的两块短板是投资运营能力以及对母体大学事业发展的支持上。换句话就是说，目前中国内地高水平大学教育基金会，一方面以钱生钱的能力不足，另外一方面无法将投资、运营带来的收入更好地用于促进母体高校的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上。

笔者和合作者利用25所进入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美国大学和15所进入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的数据，分析了他们教育基金会的投资运营情况以及与母体大学的教学、科研之间的关系，发现目前中国内地一流大学的教育基金会和美国同行相比，其投资收益率不仅显著更低，而且其投资收益无法和学术声誉、教学质量以及雇主声誉形成显著的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目前相关法规对中国内地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方式与行为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中国内地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投资运营并不能像美国同行一样显著促进大学教学、科研等事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内地一流研究型大学面临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与激烈国际竞争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多重压力，经费方面的紧张不能仅依靠国家加大投入力度，自身也应在经费筹集方面有所作为与担当。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正处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时期的中国内地一流高校而言，加强基金会建设是一个必需的方面。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中，中国内地一流大学应该有针对性地向美国顶尖大学学习，健全相关制度、加大募捐力度、建立健全基金会的资金运营投资，打造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教育基金会。换句话说，建设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建成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基金会。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当给大学建设教育基金会给予适当的政策红利和改革动力，例如建立健全配比基金以鼓励学校更加积极地进行募捐，创造更宽松的制度环境鼓励大学基金会进行投资，以及制定一套适合目前中国内地大学基金会自身特点的管理办法等。